

序 章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直至 19 世纪中叶，当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形成之时，日本还是一个孤悬于东方海洋中的封建小国。然而经过明治维新，其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持续 20 多年高速增长，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

日本的崛起，被人们视为“奇迹”，因此有关对日本经济史的研究也成为热门学术领域。学者们从经济学的各个角度探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著述多矣。本人研读之后深受启发，感到从经济周期问题入手，对日本经济发展史进行深入研究，也不失为一种新的角度。本文选择该课题的目的，在于探索在日本这样一个与欧美国家具有不同发展历史的亚洲国家里，经济周期依循了一条怎样的轨迹及其特点。

一、该课题的意义

第一，通过该课题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经济周期及其规律的认识和对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理解。

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以来，经济的发展便以连绵不绝的周期波动和起伏为特征。从社会生产力进步的角度来看，在经济起伏的扩张阶段，一切代表人类征服自然能

力的新发明新创造，奇迹般地似乎从地下涌现出来；在生产收缩阶段，人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史前史上从未看到的现象，即产品过剩或资本过剩、工厂倒闭和劳动者失业等等，生产力又受到极大浪费和摧残。由于周期中收缩阶段的存在，人类在推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周期的震荡程度有所弱化，但周期波动依然存在。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人类的经济社会非要遭受如此的震荡，经济只能这样波浪起伏式地向前发展？回答是肯定的，在人类社会的一定阶段只能如此。经济运行有自己的规则，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一百多年来，经济周期波动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思索，经济周期理论已成为各门派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经济周期问题，可分为三大理论群块，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周期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他同恩格斯的通信等经典著述中，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本身去寻找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揭示了周期各阶段更迭的机理及危机产生的物质基础；二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周期理论。随着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频繁发生，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关心备至。他们从自然、心理、货币、投资、创新、政治等因素解释资本主义的周期波动，对周期现象及周期中经济技术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有价值的描述。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散见在他们各派别的书著当中。美国经济学家哈伯勒的《繁荣与萧条》集各派别之大成，是西方周期理论的代表著；三是前苏联理论界的经济周期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科学院的经济学家们发表的一系列论述及一大批理论著作。他们也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来论述经济周期问题。我们之所以将其单

独列为一个理论群块，是因其有自己的特点，即前苏联成立后，在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及与欧美各国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的历史条件下，更由于该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他们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周期现象连同市场经济体制，在研究中是侧重于揭露和批判的。其学术上的特点是论说体系性强，统计资料完备，给人以恢宏和有气势的感觉。其代表著如列·阿·门德尔逊的《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尤·瓦尔加的《世界经济危机》等等。应该说我国建国后，在经济学领域包括周期理论在内，很大程度上是受苏联影响的。

上述各门派的著述，反映出人类对经济周期认识的轨迹。他们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经济周期现象产生的原因和机制。相比之下，马克思所创立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理论博大精深，它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高度，揭示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对周期各阶段的更迭机理的分析充满着唯物辩证法的巨大魅力。我们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吸取其他各派经济理论中的合理部分，把人类对经济周期的认识，进而升华成理论的这份遗产继承下去。

理论是对实践的抽象概括和理性总结。随着实践的发展，理论也应不断丰富和更新，再反转过来去指导实践。这是人类对经济规律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在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经济波动现象进行观察的基础上创立的，其周期的波动模式主要是英国。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发生了许多变化，尤其是二战后的变化更大。今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经济面貌与马克思在世时已不可同日而语。日本是亚洲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与英国等典型的欧美国家所不同的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来不及也不可能对日本的

经济波动，如同对英国那样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和分析。有关日本的经济周期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论述。马克思阐发和概括了经济周期的一般性规律，这对于所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全都适用，但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历史特点和文化背景，从而决定了周期的具体运行方式也各不相同，即使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周期运作也有各时期的特点。那么日本的经济周期的特点如何，当今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其经济周期的运作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运用马克思研究经济波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辟和深入这一课题的研究，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第二，通过该课题的研究，有助于提高对市场经济体制与生俱来的“市场缺陷”的警惕和认识，增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能力和自觉性。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所谓市场经济即指经济运行完全受市场竞争所支配的一种经济类型。众多各自独立、自主经营的私有企业构成市场的主体，价格成为市场供求变化的晴雨表。在这种经济环境下，从经济发展的剖面上看，价格机制对资源配置进行结构调节的过程，在纵向上看便成了经济周期的运行过程。

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的束缚，人们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无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恪守所谓的计划经济，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① 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是经过挫折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3 页。

和探索的中国人民所做出的正确抉择。如同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一样，经济的周期波动也不应是资本主义才特有的现象。

市场经济有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使经济迅速增长的一面，也有“市场缺陷”的一面。当由于这种“缺陷”所导致的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失衡出现时，经济周期的机制便会开动起来，开始行使调节的职能。不言而喻，由于社会制度和所有制结构的不同，不可将我国的经济波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简单类比，但可以肯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波动是存在且不可避免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正常的周期波动是市场经济体制是否确立和完善的可参照性的标志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总量和结构的失衡是难以避免的，而这二者失衡的程度不同，经济周期客观调节机制的力度也不一样。当二者失衡的程度严重时，经济周期规律的调节会以剧烈震荡的方式体现出来，使经济出现停滞或倒退。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形，政府的干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如果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去自觉地替代周期规律的部分职能，使总量和结构的失衡不至于过分严重，那么上述情形则不易发生。

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运行不可能表现为直线运动，而表现为周期波动的过程，如何运用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如何使经济波动像健康人体的心脏一样正常跳动，而不是忽快忽慢、大起大落，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课题。

同欧美国家不同，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确立起来的。一百多年来，日本受益于高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其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然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周期性的危机或衰退相伴随。如何加强和完

善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成为日本政府尤其是战后历届政府的主要职能。日本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和方针，在某种程度上都直接与间接地同反危机或反衰退有关。在此过程中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经过反复的摸索，终于在战后形成了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独具一格的宏观经济的管理模式。邓小平同志还说过：“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①日本是中国的邻国，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同处于东方的文化背景之下，在忽略时间位差的前提下，其经济的发展，有许多可比之处。深入开展对其经济周期形成与运作的研究，对于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和提高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应该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第三，通过该课题的研究，有助于增强对西方经济趋势的判断能力，使我国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

我国现在正坚定地奉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及我国在贸易投资与金融业务等方面与西方国家合作的日益扩大，我国经济与西方经济之间的互相依赖也必然会加强。在我国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往来中，中日经贸关系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1972 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到 20 年后的 1993 年，两国经贸关系已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在贸易方面，两国贸易总额达 390 亿美元，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首次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在直接投资领域到 1993 年底，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3 页。

日本在中国已有各种投资项目 3488 个，合同金额达 30 亿美元。该年日本在中国投资企业数首次超过对美投资企业数，占日本当年对外投资企业数的 32.8%，居世界第一位。可以想见，今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将会更加密切。在这种态势之下，日本的经济高涨和衰退，都会通过经贸渠道传导至我国，对我国经济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双重影响。例如日本经济高涨、日元升值对我国出口有利进口不利。高涨后期，利率上扬对我国引进日本资本不利。衰退前期利率下降，日本国内资本过剩，则有利于资本引进。随着我国对国际金融活动的参与及其展开，对股票债券市场的变化，也应备加注意。而上述所有变化都是以经济周期的变动为转移的。因此，要准确地判断西方经济趋势，不可不研究经济周期问题，而深入地开展对日本经济周期的研究则有更重要的意义。

二、学术界对日本经济周期问题研究的现状

日本经济周期问题历来受到日本和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学者有过著述。仅以日本来说，较著名的经济学家就有横西光速、守屋典郎、大岛清、中村隆英、小林义雄、筱原三代平等人。前辈学者所做的工作为我们深入进行该课题的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学术观点的差异，目前有关该课题的研究还存在下述不足和倾向。第一，前辈学者有关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散见于他们的经济学、经济史和通史等专著当中，不甚系统；第二，前辈学者的一些论著大多成书于 50~60 年代，且研究的断限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或战后初期。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将战前和战后周期的运动连成一线专门进行研究的尚未见过；第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资本主义世界困难重重的年代，且此期间发生了 1929~1933

年的大危机。出于正直学者的忧患意识和某种社会责任感，他们在研究中侧重于周期中的危机阶段，甚至有用研究危机替代研究周期的倾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周期各阶段的更迭“正如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就会不断重复这种运动一样，社会生产一经进入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也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而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①由此可见，一个完整的周期是由扩张和收缩两个阶段组成的。因此只有将这两个阶段同时加以研究，才能客观地认识经济周期运动的全貌及内在规律性；第四，经济周期的形成有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包括利润率、投资和消费等。非经济因素包括战争、初级产品供给的变化和政府的干预等。在以往的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即重在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忽视对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研究。在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两者的关系上，重在强调经济因素。以对政府干预的研究为例，由于强调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人们强调的是它做不到什么，从而忽视了对它还能做到什么的研究。前已述及，与 19 世纪欧美国家的政府不同，自日本资本主义发生以来，日本政府的作用特别突出，它从来未单纯地出任过所谓“守夜人”的角色。开展对经济周期中的日本政府职能的研究，今天看来是格外有意义的。

总之，国内外学术界迄今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形成、运作和演变的历史，尚缺乏进行总体的研究。这也是作者选择这一课题的原因之一。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94～695 页。

三、该课题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

作者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为研究指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价值的观点和分析方法，研究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历史。

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形成和运作，是一个复杂的经济过程，它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因此，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尤其是对作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形成和运作的历史，进行了细微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而且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遗产。这使我们得以他们的理论为指导，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周期理论有丰富的内容，但应着重理解的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马克思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观点，考察了经济周期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过程和条件，指出了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

第二，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社会再生产条件，从固定资本再生产的角度探索了经济周期运动的规律，指出固定资本更新是周期运动的物质基础。

第三，马克思揭示了利润率规律，认为利润率规律的作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33 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06～207 页；《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95 页。

是周期之间、周期各阶段之间相更迭的主导机制，从而揭示了周期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① 马克思并非只是从消极方面对待危机的，认为危机有调节经济总量和结构失衡的功能，它“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的恢复。”危机是“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的。

第四，马克思剖析了高度发达的信用制度对周期波动的传导作用。它充分肯定信用制度对加快生产力发展所做的贡献，同时指出它也是促使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信用制度导致利率机制也加入到周期的过程之中，利率机制与利润机制一起通过市场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导致经济波动。

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问题所做的论述和剖析，为我们深入研究日本经济周期问题奠定了基础。当然，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不等于把它当作教义，生搬硬套地解释具体情况不同的和处于不同时代的各国的历史。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④ 马克思的周期理论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普遍性。但同时也应看到，经济周期是一个国家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发展历史、国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7～548页、第280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8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8页、第404页、第56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情和文化背景，这就决定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周期的形成和运动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还应看到，马克思的周期理论是在对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实际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形成的。事隔一个多世纪的今天，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从事该课题研究时，必须在马克思有关经济周期的普遍原理的指导下，针对日本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进行科学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形成和运动的特点。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本文将采取历史考察、经济因素分析与非经济因素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本文拟对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历史进行梳理和考察。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除中间一段战时统制经济时期外，其经济的发展一直以周期的起伏波动为特征。今天的日本是由昨天的日本演变而来，日本今天的经济周期与昨天的周期有机相连。在历史任何一个时点上观察，每个周期都是周期链条上的一环，原因连着结果，结果又成为原因，甚至在最彻底的破坏和最剧烈的震荡之后，任何时期都不是完全重新开始，现在同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对过去周期的研究不是目的本身，不过是借以更深入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的一种手段。

经济周期的形成和运动是一个有节律的经济过程，是由其内部各种经济因素决定的。前已述及，这些因素是指利润率、投资、消费、产业结构、商业和货币信用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周期的出现，其原因都是相同的。但周期史表明，迄今为止没有两个经济周期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每个经

济周期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的存在，是同某些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密切相关的。所谓非经济因素，是指在经济周期运行中干扰经济的正常波动，使经济运行偏离其正常波动轨迹的诸因素。它们包括战争、自然灾害、初级产品供给、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政府经济的干预等。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不仅要注意那些决定周期运行的经济因素，而且也要注意那些影响和干扰周期运行的非经济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对周期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同时把握住各个周期的特点。如上所述，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周期的运行影响很大，如何使周期波动处于正常状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加强对经济周期中政府干预这类非经济因素的研究，其意义在今天则显得更为重要了。

研究经济周期问题离不开数量概念，无数量分析就谈不上周期之间和周期各阶段之间更迭的质的界定。对周期波动幅度地判断和周期特点地分析也都无从进行。因此，本文尽可能地使用目前在国内所能获得的统计资料和数据，力图使该课题的研究建立在客观、准确的基础之上。

战后日本十分重视各种经济指标的数据统计，这给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本文战后部分所引用的即为日本官方所公开发表的经济统计资料。战前的统计工作虽不能说无，但远逊于战后，这就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以工矿业生产指数为例，日本于 20 年代才开始编制，而且是年度统计。其实，对于周期阶段的界定来说，月份统计才更有意义。在战前数据统计不甚完备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战后有关学者编制的长期统计和某些经济史和专史所载的相关资料来弥补，其中主要有：苏联学者列·阿·门德尔逊的《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3卷本、尤·瓦尔加主编的《世界经济危机（1848～

1935)——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历史比较资料》；日本学者楫西光速等合著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多卷本、大岛清的《日本恐慌史论》和有泽广巳主编的《昭和经济学史》等。这些学者们的学术观点与我们不尽相同，甚至在对个别问题的认识上完全相左，但其著作中的资料却十分珍贵。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鉴于该课题时间跨度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有关资料收集之不易，加之作者是在日本之外的国度研究日本经济问题的，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尽管如此，作者仍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前人辛勤耕耘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尽自己微薄的力量。

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序章、第一、第二、第三篇和终章 5 个部分。序章的主要内容如上所述，即本文的意义、学术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方法等；第一篇的内容，主要是分析论述了日本经济周期产生的前提条件；第二、第三篇的内容，主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经济周期进行考察，其中重点分析论证了每个周期形成的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及其影响。在此，之所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原因在于战后日本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皆发生了变化，周期运行也呈现出某些新的特点。终章的内容，主要是对战后周期变形的原因进行理论上的探讨，重点分析了日本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方式和特点。

限于作者水平，谬误之处当不在少，敬请师长和读者批评指教。

第一篇 日本经济周期运行的历史前提

第一章 经济周期运行的物质条件 ——日本资本主义 工业化的初步实现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再生产周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在前资本主义的奴隶制、封建制时代，由于生产工具落后，社会产品的增长极为缓慢。若无战争、自然灾害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震荡，经济的发展几乎呈一条迟缓向前的直线。而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情形则大不一样了。人们看到了在资本主义史前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即社会生产的发展呈周而复始的、剧烈颠簸的起伏状。在这种生产周期的收缩阶段（或危机阶段），社会经济肌体瘫痪的原因，是部分产品的相对的生产过剩；在它的扩张阶段（或称繁荣阶段），生产规模呈痉挛式的扩大，生产力又得到跳跃式发展，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机器生产的工厂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再生产周期产生的物质条件。因之，若研究日本的再生产周期史，有必要对其工业化的进程进行一下考察。

第一节 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起点

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自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始，日本农村即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然而，从那时起至幕府末期日本开

港时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封建幕府实施“锁国”政策，使日本这一岛国长期与日新月异的世界市场相隔绝。幕藩封建领主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还采取种种措施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的进行。加之，开港后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侵扰，结果直到明治维新前夕，日本社会经济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还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

工厂手工业的状况如何是衡量封建社会末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幕府末期，日本农村并行存在着两种生产形态即农村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二者虽都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但并非处于同一层次上，二者相较，后者则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

幕末的日本农村工业，其主要源流是农民家庭的副业手工业，它是应农民补充生计的需要而产生的，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前期资本主义商业高利贷资本支配下的那种小商品生产的形态。具体言之，或由商人包买农民的作为副业生产的手工业产品；或由商人将生产资金“前贷”与农民，然后以较低的价格收购其产品；或由商人向农民提供生产原料和辅助原料等，而后农民在自己家为商人进行生产。这一生产类型仅存于日本当时的织布业中，被称为“赁织”，在一定意义上说，此时的农民已成“雇佣工人”。由于幕末货币经济的发展，在上述诸类型中，“前贷”的类型较为流行。

幕末在织物、制丝、制茶、造酒、制糖、酱油酿造、制蜡、鱼粕制造和炼铁等部门还不同数量和程度地存在一些手工业工场。在织物业，有的业主租用织机，雇佣若干女工以自家为作业场所，部分地进行织物生产，这是一种家内工业与手工业工场两种特点兼而有之的生产类型。制丝和制茶业在开港后由于受大量出口的刺激，手工业工场增加数量较多，制丝业中

还出现了以水力为动力使用简单机械的手工业工场。幕府时期日本的手工业工场形态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与农村工业这一生产形态相较，在总体上，后者仍占统治地位，这是日本经济史学界所持的一般看法。^①总之，对日本封建社会末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程度不应有过高的估计。

幕府和各藩经营的工业，是幕末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殊事物，有必要对之略加分析。幕藩工业早在德川幕府中期便有所发展。19世纪50年代中期后，出于对外来势力的防范，军工企业的发展尤为突出。幕藩经营的工业主要是军事工业，其次才是纺织和其他工业。

幕末，幕府所拥有的主要军工企业有：长崎制铁所、横浜造船所、横须贺制铁所等。此外，应军工生产的需要，还开办了佐渡、生野、小坂等矿山。以开采金、银、铜等。幕府还从欧洲引进生产技术和设备，招聘外人技师来指导生产。

当时各藩尤其是萨摩、长州、土佐、肥前、越前、水户等有势力的大藩，也同幕府一样，大办军工及其有关的重工业企业，从西方购置舰船武器等，以扩充自己之武备实力。与幕府不同的是，它们还积极兴办纺织及其他轻工业企业，以增强各自的经济实力。以萨摩为例，除拥有军工、造船、制铁等重工业外，其纺织、砂糖、制纸、轧油、制革等轻工业也较发达。长州、土佐、肥前、越前等藩的情形与萨摩大致相同，不仅拥有轻工业，而且还纷纷从事国内外贸易等经济活动，而这些经济活动的收入，又反转过来多数用在了购置军械等非生产性开支上面，这是当时各藩的一个共同特点。

参见榎西光速著《全订版日本经济史》御茶水书房1975年版，第110页。另参见山口和雄著《日本经济史》，筑摩书房1984年版，第98页。

上述幕藩经营的工业，无论是其中的军工业还是轻工业等都采取了近代机器生产的办法，在技术水平上也比当时的私人手工业工厂要高，但不能据此认为幕末的日本即已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理由在于：这些幕藩官营工业在所有制方面为封建领主所有；其创办资金的来源不是资本积累，而主要是封建地租；军工工业在幕藩工业中占主导地位，而且其产品，即武器装备等未进入市场流通；其工业生产所使用的劳动力，是从下层武士中招募来的，还不是近代的雇佣工人。

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标准，考察这些幕藩工业企业，则不难发现，它们所处的发展阶段，与西方国家典型的工厂制企业还相去甚远。幕藩工业存在的意义仅在于：它们引进和使用的近代机器和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还在于它为后来明治政府创办资本主义的工业提供了一些必要的物质基础。

第二节 日本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政策措施

1868年日本经由明治维新跨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门槛。

当时明治政府所面临的形势是：在国际上，英、美、法等国有了近百年的或几十年不等的工业化的历史，而且其经济势力日益东渐。在国内，如前所述，资本主义萌芽程度较低，民间既少有发展近代产业的资本，又缺乏近代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经验。在列强环伺的国际条件下，落后的日本再如西方先进国家那样，按照经济技术的发展规律，自下而上地实现本国工业化已近乎不可能。面对这种情况，明治政府推行了“殖产兴业”政策，即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动用国库资金，加快促进资本原始积累，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通过各种方式大力推进资本主义的工业化。